

思想自由史

# 思想自由史

此書作者有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英國 柏雷

譯述者 羅志希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By

J. B. BURY

Translated by

K. L. LO

1st ed., June, 1927

Price: \$1.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 譯 言

這部最簡括的名著，述二千餘年來西洋理性與權威之爭——也就是述哲學，特別是科學，與宗教之爭；於不多的篇幅之中，可以窺探西洋思想潮流演進的大概。他或者也可以稱爲唯理觀的西洋思想史，然而思想史的名稱太泛，決非謹嚴的史家如柏雷教授者所欲加於本書。本書的出發點是『自由思想』(free thought)，然而著者不稱爲自由思想史 (History of Free-thought) 乃稱爲思想自由史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想來也有理由。『自由思想』這個名詞，相沿用以表示反抗基督教神學的唯理思想，<sup>⊖</sup>而此書上及希臘羅馬，遠在基督教神學成立以前。

---

⊖參看本書第一章。

並且討論思想言論自由的基本原理，不是專為對待基督教神學的思想說法。況『十八世紀的自然神論』(The 18th Century Deism)常常得着『自由思想』的標幟，<sup>⊖</sup>設把這本書名爲自由思想史，不特範圍和現在的有廣狹的不同，恐怕還要夾入其他的聯想。這個命名的意思，雖是根據譯者所了解的，或者也是著者可以承認的。

關於這部書的譯法，譯者或者也當說幾句話：

(一)譯者在其力量所及，務求忠於原文；然原文不但精密深刻，而且常有意在言外之處。其徵引他人的，亦多係此類文體。譯者於不敢損益中，力求其本意的顯達。深惜多少好的『射他耳』(satire)與『意蘊裏』(irony)，〔二者均係音譯，雖與本音標準，不無微有出入處〕。本來就很難轉入第二文字的，更被譯者的笨筆作踐了。

⊖參看 J. M. Baldwin: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Vol. I, p. 396.

(二)對於許多非本名的名詞，譯時不問其通常之含義，而問其在本書中之所指。因為每個名詞，都有自己特殊的歷史背景。對於本名的名詞，則有照通俗所沿用的，也有自己斟酌變更的。

(三)想懂得這書的本意，而謀執行(一)(二)兩項，則決非僅讀本書所能了事。著者在書後所列參考書表，極為精當；譯者按其所指示者涉獵，得益非淺。望有志繼續研究這個問題的，不可忽略。

(四)這本書因為想把須彌山放在芥子裏面，所以極為收斂，假定讀者曾知道許多事實的背景。這種假定，在歐洲受教育階級裏，大概還通行得過去；若是移到文化和歷史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國，自然沿途都是困難。所以譯者不但須將許多事實和引證，加以註釋，就是對於通常的歷史人物，也要將他們的時地考明，免得讀者的歷史觀念混亂。這樣一辦，於是多出幾百條註解，其中有些是極麻煩而不易找到的。考證所根據的書籍，最重要的是：

1.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1th Edition.
2. "La Grande Encyclopédie."
3. "Meyers Grosses Konversations Lexikon," 1903.
4. "Herders Konversations Lexikon."
5. James Hastings: "Encyclopæ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6. J. M. Baldwin: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7. L. Stephen: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8. Wetzer u. Welte: "Kirchlexikon," 1891.
9. "Encyclopædia Biblica."

但是還有考不出來的，如第四章中 Macolano 的身世，即找 "Nuova Enciclopedia Italiana" 亦不可得，祇能任其暫闕。並且爲了這本書，譯者將舊約與新約中重要各書，重讀一遍。

凡前章有註解的，後章略去。凡一次註西文原名的，下次略去；但遇重要處或因有同姓者易起誤解

處(如J. F. Stephen及Listie Stephen),則常重註原文。

關於註解,譯者費了許多的時候和工作,望讀者不責備他的瑣碎而且讀時不忽略過去,或者對於這書的了解,有點幫助。

譯者動手譯這本書,遠在民國八年春間,當時將未完譯稿,交北京晨報逐日發表,到第五章止。晨報鼓勵這種譯本的盛意,譯者謹藉這個機會謝謝。但是譯到第五章的時候,他就因事中止了。九年在美,見幾個著名的史學教授,如J. H. Robinson等,講起西洋文明史來,都介紹學生讀這本書,常說這是最好的一種著作,關於西洋思想潮流的大概的。於是他續譯的心思復動。十年夏間,乃將第六和第七兩章——最難的部分——譯完;十一年夏間將第八章——最後的一章——譯完。常想修改後寄回中國出版,而總沒有時間。十四年在柏林,發憤動手修改前五章,不料他自己大不滿意當日所譯,結果將這五章完全譯過。十五年在巴黎修改後三章,復多不滿



之處，將第六和第七兩章大部分修改，而將第八章也重新改譯。這就是目前這份稿子。當然裏面還一定有可以使譯者不安的地方，他現在不會發現或覺着；祇是將來一發現或覺着了，他一定虛心的再去改。他想對於學術的工作，不苟且而求自己心之所安是最重要的事。

這本小書原來的價值，在西洋早經估定，用不着此地再講。不過譯者覺得這本書傳到中國來，卻有兩重特別的使命，像是要擔負的。

第一，中國人對於自由，尤其是對於思想言論自由的態度，是消極的，放任的。我們的先賢，雖然在中國歷史上造成許多光榮的例外，但是仔細觀察起來，他們的犧牲，大概可以分爲兩種：（一）他們雖常因言論而遭禍，但是他們所遭受的，多半是其所發言論自然產生的結果，而不是有覺性的想爲言論自由的主張去犧牲，以喚醒大家對於這件主張所應當覺得的價值。（二）如文字諸大獄，且把被羅織的除開，論



到真正爲文字獲罪諸人，其所不惜身殉的乃是——至少其所着重的是——政治運動，而不是純粹知識的主張。因爲歷來的注重不同，於是大家對於這種人類進步必不可少的原則，個個應當享受的權利，竟棄而不問，任他仰着權威的鼻息，朝生暮死。二十五年前嚴又陵先生譯彌兒的自由論，〔後嚴先生改作羣己權界論〕。譯稿失而復得，嚴先生以爲或者是『天相中國』，將留此書以大有造。不意二十五年後中國的言論思想自由在內部雖然發酵，而在外面所受的摧殘，恐怕還遠過當日。更不意現在爭廢止出版法和治安警察法的人，雖然他們的舉動我根本佩服，並不曾用力發揮思想言論自由的原則之精義，以折服國人，祇是以刻板文章，說是西洋各國如此則我們也當如此。這或者是彌兒的說理，太深刻而太重抽象，且於歷史的具體事蹟太略，或者是嚴先生的譯筆太高古，二者合在一起，致減少該書在中國所應當發生的影響。但是對於這層，彌兒與嚴復所負的責任，萬

不及一般中國人，事事不願意探求基本原理所負的責任。譯者私人的意見，以為中國民族如果要為學術和他種主張掙扎出一種獨立不撓的精神，縱不能產生幾個為純粹知識的意見而燒死的 Bruno，也當產生幾個不怕終年向法庭和監獄討生活，致自己的地位和身家於不顧，而專以喚醒國人對於思想言論自由的覺性的 Bradlaugh。凡是外面壓力的侵入，都是乘着內部的弱點。設如不把這種自由的原則，深深的貫入一般人腦中，凝成鑽石似的晶體，以對抗外面的鎚鑿，則幾種紙上條文的興廢，與自由本身的保障毫不相關。以上這番話，僅為對待外面有形的權威而說；至於解除思想內部束縛理性的權威，也是思想進步的程序中一件極重要的事。關於這層，本書的篇幅雖然有限，但是其所提明的筋絡，和列舉的先型，也不無可以使讀者興奮而且能夠遵循的地方。

第二，宗教的問題——尤其是基督教的問題——現在已經是一個沸騰的問題，在國內一般人的

# 原书缺页

# 原书缺页

簡潔的著述，很謙卑的或者可以做一塊敲門磚兒。

能爲純粹的知識的主張而殉，是人類最光榮，最高尚不過的事。能自己爲思想言論自由作有覺性的犧牲，以喚起他人對於此事的覺性，是對於社會最有實利的貢獻。研究事實，從事實上抽得基本原理而鑄成的深信，纔是真的深信。溫度極高而沒有水分的空氣，在這永不停息的社會機械裏，不但無用，而且處處發生危險。最能改變未來途徑的，莫過於已往的經驗。歷史上的錯路，可以重走一遍，要是人忽略了他的教訓。

羅家倫

民國十五年四月，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

## 著者小傳

在英國——不然，在說英文的國家——裏，柏雷教授可以算是最重要的史學家，——若是我們小心一點，避免『最大的』這個名詞。這是一般歷史學的史家所能公認的。除了他自己多少可靠而真有貢獻的著作而外，他繼承 Lord Acton 在劍橋大學皇家設立的近代史教授的講座，——這是英國史學界最重要的地位；——偉大的劍橋大學中古史是他計畫的，同樣偉大的劍橋大學上古史是他領袖編輯的。〔兩書尚繼續在出版〕。很少史家的學問有他這樣淵博，很少史家的思想有他這樣深刻。John Bagnell Bury 於一八六一年生於愛爾蘭 Chogher。最奇怪的是他生於宗教勢力甚盛的地方，而他的父親 Rev. E. J.

Bury, 是一位牧師。他的大學教育, 是在愛爾蘭首都德柏林大學的三清學院 (Trinity College) 受的, 給了他一個碩士的學位。一八八五年被舉為該大學 Fellow, (這是英國大學裏的一種特別制度, Fellow 可以說是大學裏一種研究的教員, 有時授課, 有時並不授課。對於造就學者, 這種制度最善)。直至一八九三年止。自一八九三至一九〇二年為德柏林大學近代史教授; 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間, 復被推為皇家所設希臘文教授, 因為他的希臘文是極好的。一九〇二年 Lord Acton 死了, 柏雷被選繼任他的劍橋大學皇家所設近代史教授講座。這個講座, 有極光榮的歷史, 為著名的史學家如 Freeman, Seeley, Acton 先後所佔領。而且 Lord Acton 是以博學名震全歐洲的人; 他死了, 一旦劍橋大學選柏雷繼任, 自然是學術界一件很重要的事。柏雷所受的學術榮譽不少; 他是 British Academy 的會員, Oxford, Durham, Dublin 等大學的名譽文學博士, Edinburgh,



Glasgow, Aberdeen 等大學的名譽法學博士。但是這種外來的榮譽，當然不能表現柏雷本身的價值。他本身的價值，全在他精確浩瀚的著作裏。他的希臘史學，是當代少有的權威。他所著的“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G. P. Gooch 認為是最精當而能將範圍廣博的新材料，指揮如意的著作，為 Grote 以後，希臘史中重要而且有用的出品。⊖ 柏雷關於 Byzantine 研究的著作，無處不是淵博學問的表現；這些著作，和他所校訂的吉朋羅馬衰亡史 (Gibbon's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把他放在近代史學界中，最前的地位。⊖

他的著作極多，在此不能盡列，也不必盡列。現在祇是把重要而成本的書籍，以年代的次序，列入以下簡約的表中。

⊖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484. Gooch 也是當代英國史學界最有學問的一個人。

⊖前書，四九四頁。

## 所著的書籍：

-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 (1889).
- “Student’s History of Roman Empire from Augustus to Marcus Aurelius,” (1893).
-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1900).
- “The Science of History”(Inaugural Lecture)(1903).
- “Life of St. Patrick and His Place in History,” (1905).
-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Harvard Lectures) (1908).
-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Late Roman Empire” (Creighton Memorial Lecture) (1909).
-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Ninth Century,” (1911).
- “Romances of Chivalry on Greek Soil” (Romanes Lectures) (1911).